

出版书单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中山岐澳古道五桂山段首次被登记存档,林则徐、孙中山、郑观应曾在此留下足迹

周剑:我们不只找文物,也给文物“找未来”

我在广东找文物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自2023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工作在广东全面开展以来,《羊城晚报》密切跟踪报道,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陆续推出“我在广东找文物”系列报道。

此次,记者跟随中山市博物馆副馆长周剑的脚步,探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陆地段的重要通道之一:岐澳古道五桂山段——



中山市博物馆副馆长周剑

则徐从香山县城南门出发,“又十里石鼓墟,过此即山路,曰平迳岭”,然后前往澳门巡视。据此判断,这条石板路即岐澳古道五桂山段。据说,1878年,12岁的孙中山经过这条古道赴檀香山求学;19世纪80年代,家在雍陌村的郑观应也常由此古道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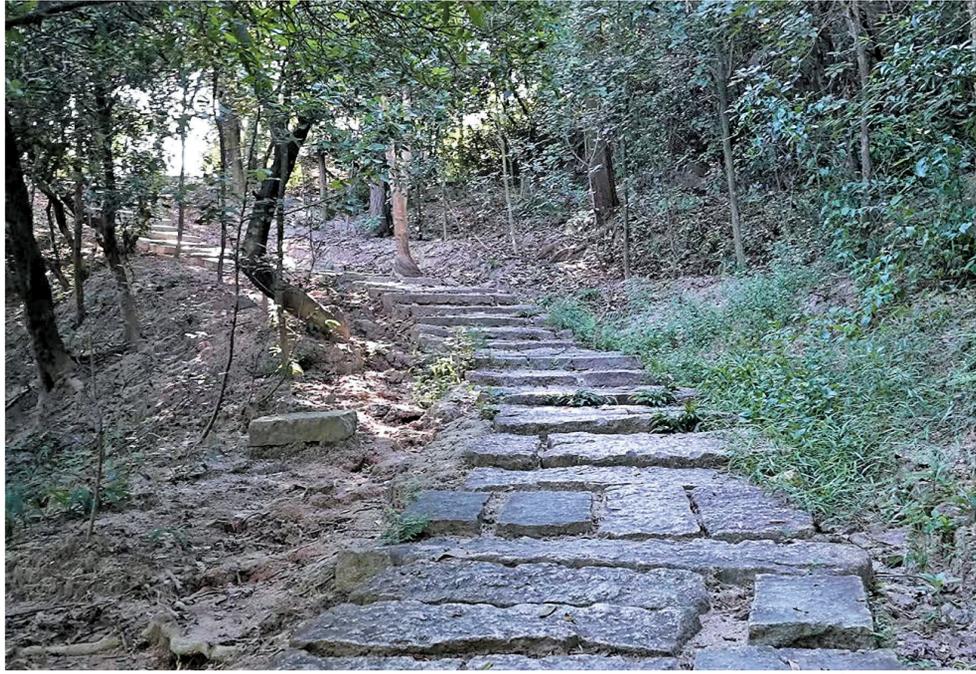
作为在中山境内现存唯一的山地型驿道,岐澳古道五桂山段形成于明末清初,坐落在中山市石鼓村至石莹桥村的山间,全长5.5公里,其中有约500米的原始遗存。它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地理信息与文化记忆,是“四普”中被登记存档的新发现代表性文物之一。

从荒草古道到文化地标

“岐澳古道五桂山段的普查工作和其他文物点迥然不同。相较于往往是单一建筑的文物‘点’,岐澳古道五桂山段呈线状分布,且串联起寺庙遗址、路碑石刻等丰富的附属遗存,工作量和普查难度远大于其他文物点。”周剑说。

他认为,“四普”相较于“三普”而言,最大变化在于要求更高,测绘记录的精准度也更高,“三普”时我们都是手持GPS,在山区密林误差很大。现在实地调查都用统一配发的RTK设备(厘米级北斗实时差分定位仪),让我们这次对岐澳古道五桂山段有了更全面的测绘记录。”

由于最初在“三普”期间发现岐澳古道五桂山段时,它的留存状况不佳,公布条件尚不成熟,所以在发现之后,中山市对其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2014年至2016年此阶段开始修缮保护工作,包括古道本体开挖、树木杂草清理、路边山坡加固等;2017年至2018年,岐澳古道开展活



岐澳古道五桂山段

化利用工作;2019年,岐澳古道五桂山段开展修复提升工程,包括排水处理、环境整治和局部修复等;2021年对局部路段进行修复加固并对沿线的建筑遗址进行保护性修缮,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和标识系统。

“我们不只是找文物,也给文物‘找未来’。在这般精心呵护和活化利用下,如今的岐澳古道五桂山段已焕发新生,成为集历史研学、文旅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地标,既是中山城市文化的闪亮名片,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纽带。作为“四普”新发现的代表性文物线索,它不仅在档案中留下了精准坐标,更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延续着中山市“开眼看世界”的精神基因。”

从荒草古道到文化地标,周剑感慨:“这十几年来岐澳古道五桂山段变化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好。”“三普”时我们记录它的残破,“四普”时我们又见证了它的新生。一个人很难经历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期待下次普查,或许在这段石板路上会有新的故事等着被发现。”

在“传帮带”中增加文化认同

周剑曾问过所有参加“三普”的老

队员对“三普”的感受,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很累但很快乐,那段普查经历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周剑回忆起自己参加“三普”的时光,由于是第一次参与全国文物普查,每一处文物点对考古专业出身的他来说都相当于一次新发现,每一次实地调查都让人感到新奇且振奋,“三普像考古,惊喜在‘发现’;四普像回访,责任在‘守护’。在普查期间,一群人翻山穿林,跑遍全市,充满了成就感。”

因此他也非常鼓励年轻人参与到普查工作中来,无论对专业技能还是对个人素质,这都是难能可贵的锤炼。中山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队员郑楚莹曾和周剑一同参与岐澳古道五桂山段的实地调查,她对周馆长的体力记忆犹新:“我们一起爬五桂山,他连大气都不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拖累’,他能一口气走完全程。”

在普查过程中,对于年轻普查队员拿不准的文物点,周剑会在现场帮助核查,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拍摄记录,对于文物点在“三普”时的状况更是如数家珍。而对于周剑而言,“传帮带”的意义不仅限于文物普查工作中的经验传承,更应延伸到群众对在地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延续上。为此,中山市博物馆专门组织策划了“我是小小文物普查员”系列体验活动,引领市民和青少年学习文物保护知识,共享文物保护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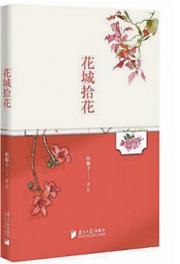
“文物自会说话”

周剑是湖北人,大学时读的是考古学专业,2000年毕业后便来到了中山市博物馆工作,如今已是馆内馆龄最长的成员。25年的一线文博工作,让周剑对香山文化怀有深厚情感,中山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曾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缺乏历史底蕴。他们只要来中山市博物馆看看出土的文物,从先秦的石器到明清的商贸遗存,我们不必过多解释,那些文物自会说话。”周剑认为这即是考古和文博相辅相成的地方:考古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佐证,博物馆则让田野中的考古成果能够被普罗大众所知晓。考古与文博工作的意义,正在于让埋藏的历史“开口”,而岐澳古道五桂山段便是最鲜活的例证。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也。”在那个因蒙昧而落后,因闭关锁国而与世隔绝的时代,岐澳古道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当年官民往来、商贸流通的生命线,更是香山地区乃至中国通往世界的重要桥梁。

岐澳古道五桂山段承载的不仅是交通功能,更是一段立体的文明演进史。正如周剑所说:“只要有人愿意走近它、读懂它,古道就不会老,因为历史永远在场。”



《花城拾花》
秋藤子 著

《花城拾花》以春夏秋冬四季为时间线,60篇文章记录下“花城”广州超过160种花的纷繁花事。本书附有赏花地图,是一本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岭南赏花小集。



《人间烟火味》
黄剑丰 著

本书是以粤菜为核心的美食散文集,由七十篇散文组成,按照文章所写的美食类别分为八个篇章,涵盖主食、荤菜、小吃、时蔬、鲜果等丰富品类,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徐徐铺展美食世界的万千滋味。



《千里之行》
林旭娜 著

本书描绘了陈映镛、潘鹤、郑锦、梁家勉等15位广东人千里之行的人生奇旅,作者通过十多年的不断采访、资料搜集,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生命历程,展现广东人文精神光彩。



《半醉半醒是一生——重读现代新诗》
周笛 著

本书以胡适、沈尹默、郭沫若、汪静之、朱自清、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十位新诗诗人的代表作为窗口,梳理了中国新诗的脉络与命运,点燃人们亲近新诗的热情。



《古画里的岭南》
《雅藏岭南》编委会 编著

本书从岭南古画切入,以风物、博物、人物三种不同的视角,通过对明清以来的岭南画家笔下的100幅山水、花鸟、人物画等进行赏析,展现多面向、多层次的岭南风貌。

寻“缘”,从黄土高原到岭南都市

□董彦成

《托钵记》收录了汪泉的九部短篇小说,在西北黄土高原与岭南都市的地理跨度中,勾勒出出现代人在生存困境里寻找生命联结的精神轨迹。

前五部短篇小说都植根于西北大地,所写故事饱含血脉深情,例如《自封为司令的爸爸》聚焦了父子情,《掘墓时刻的烟火》聚焦了兄弟情等等。独特的方言、食物、历史事件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在广州印象系列中的四部短篇小说中,邻里情、友情等主题成为核心书写对象。汪泉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将日常生活中对不同场景的观察进行了细致地观察描摹。在语言层面,他巧妙捕捉并运用粤语方言词汇,如菜市场人物胡伯伯口中的“冇”,使文本充满浓郁的地域语言特色;在环境描写方面,以“那块透明的玻璃下面,是北宋的路面,路面上的青砖长着青苔,似乎还散发着宋代的味道”这般细腻笔触,构建出独特氛围;在人物刻画上,通过“我看他后背褪色的衣服渗透了汗,那汗渍越来越大,像一朵盛开的墨牡丹”的具象化表达,生动展现人物的状态。

短篇小说《托钵记》对作者的细致观察与深度推敲也有着极致体现,当阅读一个人乘上返乡的火车,因对方便面强烈的气味不适应,父亲开始剧烈地咳嗽,阅读敏锐地察觉到



了旁人嫌弃的目光与离开座位的行为,精准契合性格敏感的孩子。通过这种细腻入微的观察描写,小说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情感表达也更真挚动人,展现出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刻把握。

除了对“地缘”有着细致描写,《托钵记》更大价值在于对“人缘”情感联结的刻画。每篇小说中总有角色身陷生活的困顿,但也总有一束来自他人的光将其照亮。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微小的善意,其实都是生命的“缘”,这种对“缘”的书写,本质上是对现代人精神孤岛化的文学回应。在《四手联弹》中,历经多次转折,主人公将“缘”传递他人,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联结和温暖。

在编年中以“纪传体”点评粤派电影

□邹高翔



从起源、创新、票房等多个维度,广东都是中国电影的重镇,但系统化研究广东电影史的专著并不多。郝朝帅的新书《粤影流金》论及广东电影的时间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24年,从完整性角度为同类研究首例,全景式展现广东电影70多年来的风云风雨。以修史体例论,本书“纪传体”为主,兼具“编年体”,所列经典影片,不是散落孤立的珍珠,而是时间藤蔓上结出的果实。

全书分为七章,也是新中国广东电影发展的七个阶段。各章及章内各节标题颇为考究,章为四字再加副标题,为四四相对八字,精炼精致,朗朗上口。全书点评影片共48部,代表广东电影70多年的成就。文风并非纯理

论型高头讲章,而是雅俗兼备,既不甚高深,也不甚浅白,语言轻松活泼。作为广东经典电影的观看指南,本书再好不过。

今年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遂复看中学时看过的《孙中山》《廖仲恺》,记忆如唤醒植物人般泛起。当时观影是为“印证”历史课本,如今则共鸣于点评,“从构思形成之初,导演就偏离了纪实性的法则,而寻找另一条新的美学路径。因为单纪实性的表现手法,难以实现他对孙中山这一段壮阔历史的哲学思考和诗化概括”。

2014年上映的《打工老板》对我来说是新片,看罢充斥“执到宝”的兴奋。就反映问题的现实性,如国际资本收割、国内制造业难题、劳资关系构建、新闻舆论监督的界限,等等。本片由深圳一家民营影视公司出品,正是特区敢闯敢干精神的写照。书中对其评价是“在所有着眼于表现深圳的影片中,《打工老板》应该是主题最深刻的,选材绝佳,表达充分,小中见大,管中窥豹”。

书中这样的精彩点评比比皆是。《跟踪追击》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广州,观众多会着迷于反特惊险情节,郝朝帅发现一处细节:从香港带回来的玩具汽车不会自动倒车,广州百货公司售卖的就可以。从而提出,细节藏着潜台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显著,内地并不比香港落后。对《雅马哈鱼档》的评析汗牛充栋,郝朝帅将其与同时代同类型的《本命年》作对比,提出本片的可贵之处:以南派电影“抒情正剧”的风格,真实反映社会帮助年轻个体户,以及广州人积极乐观的精神。《白蛇传·情》再次引来戏曲电影的“永恒之问”:戏曲和电影应偏向于哪一边?郝朝帅的观点是:本片把戏曲转换为电影的语言体系,同时还保留住戏曲内核,双方都达到了极高水准,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理论是灰色的,而艺术之树常青”。

把这些点评串联起来,便提炼成广东电影艺术追求的关键词“创新”。《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绝响》、《雅马哈鱼档》、《少年犯》、《孙中山》、《安居》、《打工老板》、《熊出没》系列、《白蛇传·情》等等,都以创新引领潮流,有的具开宗立派之功,有的成为类型电影标杆。年代越久远,可以列出的广东电影越多。这是一份历史的荣光,也是一份现实的鞭策。

本书已达到作者的两个目标:对既往之作的“后见之明”回望,对当下之作的“同时代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著名理论)审视,尽到甚至超额完成学者的职责。个中透出对广东电影创新精神的推崇,对未来的期许,又何尝不是我等记录者、传播者、芸芸观众的愿景?